

在国外,独立调查机构已经成为调查工程灾难最有效的工具之一。面对“凤凰大桥垮塌塌事

原因调查”,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外,应该尝试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

“凤凰大桥垮塌”需要独立调查

据新华社报道,至14日下午,湖南凤凰沱江大桥垮塌事故已有29人遇难,尚有数十人下落不明。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接二连三的塌桥事故,已经成为国人抹不去的心中“断桥”。

6月15日,广东九江大桥遭运沙船撞击垮塌。事故造成9人失踪,事后已打捞8具遗体,至今尚有一人遗体无法找到。在新闻发布会上,专家称大桥无质量问题。而正是专家的“无质量问题”结论引发争论。尽管广东九江大桥被撞垮塌事故7月25日正式进入司法程序,但主要针对的是相关民事赔偿,而有关责任究竟如何界定厘清、大桥被撞塌是否关涉质量问题,也是民众心中的诸多关注焦点。

民众寄希望于独立透明的事件调查配套机制,能够第一时间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所有与事件有关的真实信息可以被及时反馈给民众,如此不仅保障了民众应享的知情权,更促使事件调查在公共监督的氛围下,以完善程序演绎,走向公正裁决结果。

九江大桥调查事故的一个争议所在,在于调查机构角色定位不够独立自主,来自于事故发生所在地区所组织的调查组,先天带有“缺乏利益回避”的关联“嫌疑”。面对“凤凰大桥垮塌事故原因调查”,除了传统的政府部门内部清查外,应该尝试独立调查制度的试水。在国外,独立调查机

构已经成为调查工程灾难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可以填补政府与民众间信息资源调节的中间地带。独立调查机构具有独特的优势:调查目标明确,致力于揭示对受众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真相;调查行动由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员有组织、有计划地独立完成,调查与收集材料是其独立行为,不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利益的控制。

笔者希望,由民众举报、舆论监督组成的外部自发调查,与委托独立调查机构、政协建言、人大表决审议调查结果的专业调查、再加上政府自身的调查机构,构成三位一体的公正透明调查体系,最终找到事故发生的真相。

新京报(毕舸)

肉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120%

重庆政府出资亿元

推母猪补贴及保险

据重庆市政府最新新闻发布会通报,8月1日,重庆每公斤精瘦肉零售价达到30元,刷新了该市猪肉的历史最高价,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20%。当地政府目前出资亿元大力推进母猪补贴及保险促进生猪生产,根据当地的能繁母猪补贴制度,农民只需要出12元购买该保险;如果母猪死了,可获得1000元赔偿。

农户“今年只吃了几次肉”

“我四婆张兴素是荣昌县盘龙镇农民,她家总共2个人,孩子初中还没毕业,现在在外面帮人洗洗鸭肠子补贴家用,她家年收入大致在2000元左右,前几天我回老家去,她们说今年只吃了几次肉。”7月14日,家住重庆市荣昌县县城的教师田燕对记者称。

目前荣昌县的猪肉价格大致为每公斤24至28元,由于价格上涨,此前当地农民逢“赶场天”(当地农村集镇每隔几天的集中交易日),遇到红白喜事或做生日,就会到镇上买肉。不过,肉价上涨后,街上的肉贩生意很差,因为猪肉很难卖出去了。田燕说,即使住在乡镇上的非农居民,也开始减少猪肉购买量。

荣昌县是国内有名的生猪养殖大县,该县畜牧局对外公布的数据显示,仅2006年11月,荣昌县就“外销生猪近6万头,其中肥猪18208头、仔猪39968头”。

能繁母猪得到补贴保险

重庆市副市长吴加农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1~6月,重庆全市存栏生猪1461万头,比去年1~6月下降5.7%(去年遭遇百年不遇旱灾)。与正常年份比较,1461万头的存栏数比正常年份低12.8%,存栏生猪中的能繁母猪存栏120多万头,比去年下降3.4%,比正常年份下降8.1%,现在的存栏生猪是决定下半年出栏生猪的基础,由于存栏下降,下半年估计生猪出栏有所减少。

当地的能繁母猪补贴制度,拟按每头母猪补贴50元,政府财政需要为此补贴6000万元。能繁母猪保险制度的保费由政府 and 养殖户承担,能繁母猪险80%的保费将由政府出资,养猪的农户只需自负20%的保费,重庆能繁母猪120多万头,每头保费60元,此笔费用总计7280万元(政府财政补贴6000万元)。

第一财经日报(程维)

火车站黄牛冒充工作人员卖废票

4元地铁票

倒卖10元

青年报 一张4元的地铁票,竟以10元的高价被卖给了第一次来沪的外地客,而这高价买到的还可能是根本没法用的废票!这是记者近日在上海火车站附近地铁1号线1号口的亲身体验!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上海南站开通后,很多在上海火车站下车的乘客需要到南站换乘,一些“黄牛”便专门向不熟悉情况的外地乘客倒卖往南站的地铁票。业内人士表示:上海站与南站之间目前缺乏很好的直通渠道,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

昨天中午12时,火车站南广场,记者随着出站旅客从地铁1号线的1号口进入地铁站,刚刚走下电梯,就见一中年男子迎了上来:“南站?马上就走。”该男子一边往人群里钻,一边向旅客兜售。

12时半左右,一个背着大行李包的中年妇女急匆匆地从1号口走进来,一个瘦高个的男子立马迎上去:“到南站吗?我有票,马上就走。”中年妇女停了下来,有点犹豫地操着外地口音问道:“是到上海南站的吗?”“你是去转乘火车吧,就是那里唉。”“这地铁票要多少钱?”“10元!又快又便宜。”

接着该男子快步往进站闸机走去,中年妇女急急地跟在他后面。在进站闸机口,男子拿出一张地铁票刷了一下,让中年妇女进了站,然后伸手问她要10元钱,再把地铁票往她手里一塞,迅速走开。

据知情人士透露,花10元钱买到4元钱能正常使用的地铁票已经不错了,有的黑心“黄牛”还会把一些不足额(3元)的票甚至已经过期的废票卖给外地乘客,让他们拿着票却要钻过闸机。甚至还有“黄牛”把地铁票当作交通卡以6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外地乘客。

在暗访中,记者发现有两个貌似地铁工作人员的人不时地在站厅里晃来晃去。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这两个人也是“黄牛”,穿成那样是一种伪装。据地铁上海站的工作人员透露,地铁站曾多次接到乘客的投诉,说地铁工作人员卖高价票甚至还卖废票,但实际调查下来都是“黄牛”。(何楣 施培琦)



绿地常受虫害侵袭

贵州凤冈有偿引进 200 只麻雀

贵州都市报 从前天开始,贵州省凤冈县城管局公开面向社会有偿引进200只野生麻雀,每只10元钱,以保护城市绿地,维护生态平衡。

据凤冈县城管局局长贾黔强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凤冈县麻雀就几乎绝迹,大量农作物使用毒副作

用很强的农药,麻雀误食纷纷毙命,此外,大规模的灭鼠行动亦使得大量麻雀丧生“毒鼠强”。贾黔强说,失去了麻雀后,县城绿化屡遭虫害,循环往复的灭虫和绿地重植,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因此,该局作出了有偿引进麻雀的决定。

北京青年报

康师傅香辣牛肉面 5 连包原价 5.9 元现价 4.4 元;康师傅面霸 5 连包拉面从涨价后的 9.65 元卖到促销价 8.6 元;康师傅鼓香辣排面 5 连包 10.2 元,促销价 7.3 元……

昨天,京城几家大超市康师傅方便面的价格都有不同幅度的下调,此举仅发生在“方便面集体涨价风波”之后不到一个月。

昨天下午3时半,记者在家乐福超市方圆店看到,方便面销售区域内康师傅的三四款十多个口味的方便面在做大规模促销。超市发双榆树店也有两款康师傅方便面在促销。

专家认为如果此轮促销时间较长将瓦解“价格联盟”

涨价喊声未落 康师傅降价促销

专家认为如果此轮促销时间较长将瓦解“价格联盟”

记者在家乐福方圆店看到,康师傅香辣牛肉面5连包原价5.9元现降价为4.4元,这款产品比此轮涨价前的价格还要低;康师傅面霸5连包拉面从涨价后的9.65元卖到促销价8.6元,这款面涨价前价格为8.4元。除了康师傅外,只有一款华龙今野拉面在促销,价格从4.75元降至4.28元。

康师傅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并没有降价的计划,在北京

最近一两周也没有调价,这些促销行为应该是超市所为。”家乐福超市也否认了康师傅厂家在降价的消息。超市发双榆树店王经理表示:“每年8、9月份大学生开学前后是方便面销售旺季,因此很多商家都选择借此时机促销。”

一位商业专家表示,康师傅此轮促销如果延长到一定的期限,很难说与降价有什么区别,那么此前预言的“价格联盟”必将崩盘的断言将得到印证。因涨价导致销量下降的品牌也将做“促销”,得到实惠的将是消费者。

(简丽爽)



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据说这出自1950年著名的“梁陈方案”。为了保护古都,梁思成与陈占祥吸取巴黎与伦敦的前车之鉴,建议把新的行政中心建在西郊。梁陈方案很快被否定,所幸军队大院被留在了城外。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1980年末,已多达2.5万个。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

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育红、友谊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姜云诚认为这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在美国问了一些台湾朋友,他们的‘眷村’跟我们的军队大院如出一辙。军队系统有其特殊性,自成一体、相对封闭,我们这些孩子的世界观、道德观、玩法也和平民子弟完全不一样。”

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

军队系统自成一体、相对封闭,军队大院孩子的世界观、道德观、玩法也和平民子弟不一样

大院子女的“不寻常”生活

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MM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人去比。你看过一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各个大院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身份标志。“我印象中,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俗称‘片儿鞋’)的边是雪白

的。自行车也有讲究,卸掉后座,同伴坐在前头的大梁上。陆军的孩子片儿鞋是棕红边、深蓝色袜子,自行车座椅拔到最高,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呼啸而过。”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原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秘书的孩子,也有负责后勤采购的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里,军队有特殊待遇,改革开放以后这种优越感被逐渐地削弱。首先是经贸市场的人可以直接得到经济上的特权和利益,慢慢地人人都可以创造物质条件。哪怕我是街边扫地的,也可能一夜暴富,买奔驰车,同样用眼光鄙视你。”一位高干子弟告诉记者。

朱大可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来形容这种“身份归零”带来的那份真空状态的痛苦。这可能是形容当年军队大院子弟身份创伤的最好语句。

新民周刊(张静)

(更多内容请看新一期《新民周刊》)